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農業教育工作 參考資料彙編

第一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
農業部高等農業教育局編印

1958年11月12日

为了帮助全国各高等农业学校负责同志研究 討論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农、林大专学校教育的指示,进一步貫徹“教育为无产階級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切实办好高等农业院校。特将中央指示和陆定一、康生同志的講話記錄以及孟津翟泉、长葛閻楼、逐平和兴紅专大学的情况、調查报告及經驗等編輯成册,供各校学习和参考。

农業部高等农業教育局

1958年10月12日

目 录

- 一、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农、林大专学校教育的指示… 1
- 二、康生同志在河南郑州市对全国
 高等农业教育参观团的談話記錄…………… 3
- 三、陆定一和康生同志視察山西农学院时
 对学生的講話記錄…………… 18
- 四、长葛县閻楼乡紅旗农业科学技术大学
 情况介紹 …… …… 25
- 五、霍泉农业 大学情况 調查…………… 30
- 六、中共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和兴管理区 委员会办
 紅专綜合大学的經驗…………… 44

中共中央关于改进

农、林大专学校教育的指示

为了使农、林大专学校更有效地为农、林业生产大跃进服务,培养出又红又专的既有科学理论又有实际生产知识的农、林干部,一切农、林大专院校,都应该坚决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过去几年来农、林大专院校数量已有很大的发展,对农林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相当作用,但比较严重的存在着教育脱离生产实践的毛病。这个缺点必须迅速加以克服。为了适应农业林业大跃进形势的需要,使全体师生能够在不可多得的苦战三年中,受到锻炼,和吸收生产经验,更好地提高和发展农业林业科学,促进生产的发展,并为更有效地改革农、林大专院校的教育,中央认为应采取如下步骤:

第一, 现有农、林大专院校,除留下一部分师生经营现有的附属农场、林场,附属企业外,其余的全体师生,从本年下半年起,应有计划地一律分赴农村,实际参加农、林业生产劳动一年到二年。

某些地区的农学院学生中,有一部分是由各农业生产合作社选拔来的干部,如果这些干部原来就是劳动农

民,这些学生应当繼續留在校內学习。

第二,所有現在大、中城市举办的农、林大专院校,一律迁往农村或林区举办,使教育与生产劳动密切結合。

第三,現行的农、林大专院校的学制,須重新全面考虑,加以彻底改革。并責成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分別会同有关部門于今年年底提出一个改革农、林大专院校教育的方案。

康生同志在河南鄭州市对 全國高等農業教育參觀团的談話記錄

1958年10月15日

康生同志对參觀团的談話記錄，已經第二次整理，但未經本人审阅，如有錯誤，由整理者負責。——編者——

一

你們在南京开了一次会，听說會議开的很好，我想听听你們在南京會議中有些什么收穫解决了那些問題，还有那些問題沒有解决。在會議期間也接到过簡报，但沒有研究。

你們开完了会，又进行了參觀，可惜你們在遂平參觀之后，沒有到长葛县去看看，該县閭楼乡有个新型的农业大学，叫做紅旗农业科学技术大学。在北戴河會議期間，吳之圃同志給我个文件，这个文件很短，写得很好，反映了該校的情况。他們有一整套的教学計劃、教学組織，并規訂了学习的目的、要求、時間和科学研究等。实际情况怎样，还要去看看；不过沒有实际經驗，很难写出这个文件。他們的教学計劃和生产計劃密切結合，看后使人有很大启发，我們的教学計劃就不是和生产計劃結合的，所以想到那里去看看。鳩山大学、翟泉大学，我都還沒有去看过，这次也想去看看。如何办农学院？現在还没有底，所以想求师訪友，你們都是老师，因为都是院长了。

王发武同志向我汇报了一下，談起在河南遂平看百花試驗

田的“互接运动”，这对我启发也很大，象山西十四岁的紅領巾尙××，把棉花接在凤仙花上就結紅棉花，接到向日葵上就結黑棉花；还有把西紅柿和紅薯嫁接，上面結西紅柿下面結紅薯。因为他們是紅領巾，不是专家、留学生，他們敢想、敢干，接死了就拉倒，也沒有什么脸可丢。我記得聊斋志异上說：胡蘆可以长得象水缸那么大，它是把五个种子种在一起，等胡蘆秧长高了，把五株并在一起，就能結大胡蘆。我还听說就用这样方法把五个南瓜放在一起，也出現了大南瓜。这一切都是打破了教条的束縛，听說这个紅領巾参加了全国科普协会的會議，并做了报告。昨晚又听說商丘县道口乡有个公社叫做双八人民公社（因为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毛主席到了这个公社），这个公社有个紅专大学，他們种了一块試驗田，深翻地8.8尺，下种880斤，这是既有现实主义，又有浪漫主义，敢想敢干。他們有評級标准：如果学生每人亩产在1,000斤以上的叫做練習生；亩产10,000斤以上才叫研究生；亩产30,000斤才叫专家（当专家不容易！）；亩产50,000万斤就是博士。你看这个評級标准科学不科学。我在北京农业大学、农机学院时曾提出要学生亩产3,000斤就毕业，拿不出来就不成，这次出来看看人家是10,000斤，比我們提的多7,000斤，原来我們認為是幻想，不容易實現的，到了群众中都成了事实。而且大大超过了我們的想象。

在邢副局长向康生同志汇报这次南京會議及參觀情况时，談到南京农学院拔白旗插紅旗彻底，貫徹中央教育方針坚决，是旧大学变新大学的方向，康生同志問：“旧大学变新大学很难嗎？和猴子变人一样，是不是？”邢副局长汇报南京农学院同学自編自演“上海小姐”，康生同志說：“教授有沒有自編自演的？我在沈阳艺专时，就有教授把双反交心的情况自編自

演的，你們應該發動教授自編自演。南京農學院批判卜凱的學術思想沒有？南農應當批判，各農學院都要批判，這是金陵學派，它在校校都有影響”。

當匯報到在南京開會時，有的學校提出要畝產小麥70萬斤，水稻80萬斤，邢副局長說：“大家的干劲發動起來了，但信心還不足”。康生同志說：“試試嗎！搞出算數，搞不出來拉倒，那有什麼關係，我就總想麥子能長一丈高，多好。”

匯報到農業部下放幹部在許昌河街鄉辦起八一農業大學時，康生同志馬上說：“下放好啊！這些幹部在農業部就辦不出大學來，這是條經驗，機關學校的幹部又有用又沒用，一個是思想解放，真正和勞動人民和實踐相結合，就有用；一個是思想上不解放，和群眾脫離，和實踐脫離就沒有用。由此看出，怎样做新中國的人就很是個問題。”接着又問：“農學院有沒有農民運動這門課？我覺得很值得考慮，每個農學院的畢業學生不會搞農民運動，就搞不出豐產來，這問題請你們研究一下。”

貴州農學院楊副院長談起離校時煉鋼還沒有搞起來，康生同志說：“主席都煉了三爐鋼，你們還不煉！”

廣西農學院劉副院長匯報時，談到了學校由鄉村搬到城市，還蓋起很漂亮的大樓，現在外面壓力很大，只好把大樓門鎖上到田間去，康生同志說：“大樓還是好，不是以後不蓋大樓，而是要你們取得住大樓的資格”。

二

我有一個問題要和大家研究一下。

在中央和毛主席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下，中國教育有了個新的面貌，學校大量發展，提高了質量，發展了科學。但是問題仍很多，任務還很大，尤其是15年要普及大學教育還是

严重的任务，如何按期实现或更早期地实现，还需要我們做很多地工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針已經提出来了，但是，贯彻执行这一方針，找出适合于中国情况的馬列主义的教育原則的一套教学方法、教学制度，仍需大家好好摸索。但不管怎样困难，总的來說，教育还是找到了方向，前途很有希望，文化革命已在各处开始，我想苦战三年之后，文化革命的高潮会比今天有更大的发展。

在文化革命的总的形势下，出現了两类农业大专学校，一种是群众的，叫做新型的业农大学。另一种是过去建立的各省的农学院。同志們在講話中再三提到鳩山大学、翟泉大学等，象这样的学校，全国各地都有一些，但河南比較突出一点，同志們在南京开会，南京雨花台就有一个农业大学，不知道你們去看过沒有。鳩山、翟泉、閻楼这些农业大学，都是随着生产大跃进，随着文化革命出現的新型学校，这种学校在今天來講是产生于农村，服务于农村的生产，是农民經過去年社会主义教育、整风、反右斗争，在生产大跃进中广大农民群众自己創造的。我們怎样看这种学校？怎样估計这种学校呢？这种学校和原有的农业院校比較，那一种更适合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的需要？按中央的方針和新的观点來講，那一种学校更正規，更符合馬列主义教育原則？这值得我們考虑。办农业院校的同志更應該考虑。其他的学校象师范、工业，将来必然也會出現新型的学校，但是在农业上，今天就大量的出現，很突出，这个問題已經摆在各位同志的面前，閻楼农业大学在总结經驗时提出：我們的学校“真正成了新型的农业大学。”同志們，人家这样提出来摆在我們面前，我們是反对呢？还是承認呢？要深刻地想想这个問題，这是放在农业院校面前要我們表示态度，我們怎么办呢？同志們應該研究研究。他們在总结文件的最后写道：“在初步胜利

地基础上,以百倍的信心与勇气,向着更为完整的新型的农业大学高歌猛进”。說的很好,这件事对于我們今后办学很有关系。

刚才有的同志提出农学院如何办人民公社呢?这确是一个問題,我却要反过来問,今后如何办农学院?这个問題不明确,就不能办好人民公社。虽然你們南京會議开的很好,但仅仅是开端,要研究我們怎样办,現在有两类农业院校,在农村的学校,認為他們是新型的农业大学,按传统来講,我們叫我們的农学院是正規的农业院校,这就发生了矛盾,那一方面說他們是新型的,这一方面說我們是正規的,到底誰的对呢?是我們跟他們学呢?还是他們跟我們学?

对于新型的共产主义的农业大学有几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認為我們是真正的正規的农学院,現在农村出現的不过是农民业余学校而已,也就是不承認他們是新型的共产主义的农业大学;另一种看法是:也承認你是新型的正規的农业大学、也承認我是新型正規的农业大学,这样对待的方法是:你是你,我是我,分道揚鑣;还有一种看法是:承認他們是新型的共产主义农业大学,但还是雛型的,不完备的,将来学校的方向是正規的方向。閩樓农业大学的文件上,农民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們說:“轉变大学的过程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思想斗争的过程,迷信很多,但主张办大学的同志說,我們办的是农业大学,只要能把各种庄稼搞好,能高額丰产就行了,又不是比洋樓的”。

原有的学校應該肯定說是社会主义的学校,不是資本主义的学校,在某些科学設備上、学习上比某些新型学校的程度是高一些,过去办这种学校,有必要,也有成績,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情况看,这类学校可能成为一种过渡的形式,要由旧大学过渡到新的大学,是否可以有这种看法。按照这种看法,結論應該是改革我們的学校,吸收新型学校优点,走那个方向,

并且帮助他們提高。这类問題需要辯論，在中央也沒有正式談过。那类学校在某种意义上講超过我們，农民說：“你說你們是正規的，但农产品搞不过我們，你們說你們是科学，但是粮食就沒有我們打得多”。河南农学院洋楼不錯，但粮食产量不如人家。当前不是比洋楼，而是比粮食，現在最好由洋楼走向田野。这是对两种农业院校如何看法，走那个方向的問題。

現在看来，这两种学校，一种是生动活泼，干劲冲天，另一种是形势逼人，四面楚歌。广西农学院的同志講，小学生都來欺負农学院，日子不好过。應該說办这种学校压力很大，自己办不下去，教員教不下去，学生也学不下去，成了“三不”，尤其是南京一开会，各地一参观，同志們更感到如此。这样就会产生两种心理状态，一种是悲观失望，希望組織部赶快把我調走吧！沒干头，沒希望了！越看越自卑，越看越沒信心，我相信在当前大跃进的形势下，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不会多的。另一种心理状态是認識到形势逼人是非常好的事，赶快找办法。正象毛主席所講：任何革命都是逼出来的，人不逼不行。炼鋼你們有沒有經驗，是不是逼出来的。大跃进我看也是逼出来的，因为又穷又白。所以形势逼人是好事，要求改进工作，要求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是受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資產阶级的压迫，起来革命，所以是英勇的，是有战斗力的。广西农学院同志說形势逼人相当厉害，我看整个說来还没有逼够，現在如果說是四面楚歌，應該有八面楚歌。压力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越压越鼓起劲來了，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压垮下去了，但是經過整风、双反，經過学习中央教育方針，經過生产大跃进，农业上出現新型学校时，相信你們是經得住压的，压不垮，今天还可以压一下，越压反而会压好，今后形势还要压，不压压不好。象貴州农学院同志所談的，学校的白旗还拔得不

彻底，教学上对资产阶级专家还有迷信，这一方面是工作做的不够，另一方面是外面的压力还不足，而到外面一看，拔白旗的信心就增强了。同志们不要觉得没办法，失掉信心，在南京开会时，所以感到形势逼人，这是农民生产运动飞跃向前发展，使你们感到落后，矛盾更加暴露。矛盾暴露出来，就是有了解决的条件。

这次会议开的好，参观的好，就是大家更有信心，更有勇气了。

这次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会呢？一方面讨论中央对整个教育的指示，另一方面讨论北戴河会议关于改进农、林大专学校的指示。北戴河会议上讨论整个教育方针，对各类学校都没有讨论，只对农林学院进行了讨论，做了决定，中央为什么特在北戴河会议上对教育除有总的指示外对农林学院还有单独的决定呢？这是一个什么事呢？我们研究了农业部直接领导下的北京农大和农机学院。我们领导上还有官僚主义，就我自己说，自去年抓大学教育以来，对工科和综合性的大学看的较多，对农林学院看的很少，北大、清华、师大、人大，我是常去，农大、农机、林学院，除了这次八大会议后去了一次之外，过去就没去过，也没有去调查一下，因此，似乎觉得那里的問題还少一些，但这次八大会议之后，我在北京跑了十五个大学，在这中间到了农机、农大，林学院我也是匆匆地看了看，觉得北京三个农林学校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假若整个生产大跃进，是农业的跃进推动了工业，那么在学校来看，工科学校虽然也有問題，但农林学校比一般的学校还落后。我在今年春天到哈尔滨，那时觉得东北农学院办的还好一些，没有感到农学院比工科学校差；到沈阳农学院没有和他们详细研究，觉得学校成绩还不小，只是思想上有些保守，沈阳工学院、师范学院、艺术

学院比农学院进步一些，但印象不是那么突出，等到在北京看了这三个学校之后，就较明显地看出来，在高教部时代，高教部没有好好领导，属于各部门的时代，各部门也没有很好抓起来，因为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到农机时，把农业部高教局也找去了，发了一顿牢骚。这三个学校在北京的大学之列，感到突出落后，所以要求农业部、林业部、北京市委、和学校党委好好把这三个学校检查一下。当时提出为什么农业部要领导搞这两个学校，林业部要领导一个学校？是不是下放给市委办会好些呢？领导这三个学校一定要有一个目的，看来到不如交给市委办起来更好，一定要彻底检查一下，有一天和农村工作部陈正人同志到主席那里，谈起学校问题，把农大、农机的問題，向主席做了汇报，主席当时立刻指示：城市办农学院、林学院，根本不妥当，这些学校应该立刻到农村去，要同农民一道共同苦战三年，这些学校并不取消，但必须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同群众生产打成一片。由主席的指示来看，就提的更加明确了，于是农村工作部、农业部根据主席的指示，处理了农机、农大、林学院到农村去的问题。在八月北戴河会议时，主席很关心，第一天做报告时，就提到这个问题，并问我们处理的结果如何？北京的三个学校是否下去了？我们回答说已经照办了”，农业部已有报告给中央。正是由于这样，在会议中讨论农业问题时，搞了一个关于改进农、林大专教育的指示。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我所以要这样详细地说，是告诉大家根据主席的指示和关心，做了这个处理和决定的。主席的谈话虽简短，但对农林学院却是根本的原则的指示。主席说有些工业学校，因为工厂在城市里，所以在城市还可以，但农学院、林学院就不应该在城市，在城市必然脱离实际，脱离农民群众。我再三和同志们讲这不是简单的房子搬家问题，而首先

是思想搬家的問題，應該把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好好想想。大家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有個特點是城市統治農村，不是城市與農村結合，相反的，是使之更加對立，分離，以便宜剝削農村，統治農村，這點資本主義社會比封建社會特別明顯，資本主義社會的農學院是資本家通過它訓練出人才來剝削、壓迫、統治農民，統治鄉村，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把農學院放在城市里，是為他們的政治服務，是適合的，他們的這種做法是有目的的。我們在全國解放之後，接收了舊社會的農學院，舊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自然農學院也擺在大城市，他們是為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買辦資產階級服務的，是為了分割城市和鄉村，是使農業科學幹部和廣大農民對立起來，也是符合於他們的政治目的的。我們剛接收把學校擺在城市里，利用城市里的教育機構和教育人員，在初期不能說是錯的，但是應該說這是沿着老習慣建立農學院，而沒有詳細研究這個問題就照搬下去，這就是問題了！在經過三大改造、合作化之後，尤其是經過整風反右之後，農村生產大躍進，教育的大改革，初步注意這個問題，在今天生產大躍進和文化革命的形勢下，就不能認為是正確的。我個人了解主席要大家下去和搬家，就是我們要徹底肅清資產階級殘余思想在農業科學上和農業教育上的影響。這個看法對不對，請同志們研究。

主席一聽匯報，馬上提出在城市不能辦農學院，林學院的指示，代表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意見。

一次我到沈陽參加東北三省協作會議時，在火車上無意中碰上了張子良同志（他是個農民，在延安我們認識，現在在帶嶺森工實驗學校當校長），由簡單的談話中我發現他是一偉大的教育家。他給我提出幾個問題，首先他問：“北京沒有森林，為什麼要辦一個北京林學院？搬到林區去多好？”“為什麼鋼

鉄学院不搬到鞍山”他說：“應該是生产在哪里，学校在哪里，不能城市在哪里，学校在哪里”。我問他們学校学习多少時間，他說：“学什么功課，訂多少時間，为什么一定要訂四年、五年？我是主张学什么专业，訂多少時間”。再談到講义时，他說“我編講义有一个原則，就是一年換一次，有了一年的新經驗，为什么还要照老的教下去呢？教員說我是农民，不懂这些。尽管有人反对我，我还是坚持一年換一次，有了新經驗，临时插入，甚至把原来的去掉”。你們看这做的很对第一、生产在哪里，学校在哪里；第二、学校学什么功課訂多少時間；第三、講义一年換一次，有了新經驗，馬上插入。我觉得这个农民老干部是个教育家。談到科学研究，他說：在北京是不行的，还是到林区好。

主席的思想代表了广大农民的思想，是用馬列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問題的。

主席提出要大家下去，是临时的下去呢？还是永久性的下去呢？大家要考慮。我看不管校址在哪里，农学院如果脱离了农民群众，脱离了农业生产实际，脱离了整个社会生产的需要，无论如何都办不好，也許有些同志会这样想，农学院有农、牧場，又不脱离生产，能不能办好呢？我說今后可能比过去会办的好些。但真正要办好，光靠农場是不行的，必須和广大农民群众相結合，河南鳩山、翟泉这些大学为什么办的好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是省委的正确領導，这是在全民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产生的新型农业大学，若沒有群众运动，沒有生产跃进，就不会产生这种学校。因此农学院的同志們必須注意，教育結合生产劳动，不仅是自己办农場的問題，而必須和广大群众的生产相結合。怎样結合呢？这問題还没有完全摸到，同志們必須想想。今后的学校尤其是办农业学校，还想

脱离农民、脱离生产、脱离社会孤立办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若有人仍旧想这样作就必然是一事无成，四面楚歌，形势逼人，小学生也来欺负！现在社会的发展和学校教育的发展，使教育一天天和社会相结合，成为社会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河南閭楼农业科学技术大学的文件上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大学成了农业社（现在应该说是人民公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志们，必须注意，学校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离开社会、离开农民、离开生产，还想搞过去的一套是不可能了。同样学生，又是农民、工人，又是研究员，又是干部，一句话是：“社会的成员”。所以怎样办农学院当应进一步考虑。

同志们，你们这次会议开的很好，有决心去放卫星，搞高产计划，编写大纲教材，这都很好，都需要，但重要的是如何和农民、社会打成一片，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不了解这点，就不了解主席指示的精神实质。能不能苦战三年再分家呢？我看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想学校中应该有这样一门课；叫“农民运动”，如何作法，什么形式，插在那里我都没有想，总觉得学校学生应该学这个问题，在教政治课中要突出讲这个问题。农民问题是马列主义中重要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并不是所有兄弟党都根本解决的，也不是所有的党员对这个问题都有正确看法的。在农民问题上，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教政治课，尤其是在农学院，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马列主义基础、哲学中，农民运动问题都是重要问题。过去我也想过，农学院的政治课也和一般的学校一样的讲，今后应把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问题好好讲。

在业务课上要不要讲农民问题呢？我说，不会搞农民运动

的人，是不会搞好生产的。这問題与你們业务分不开，一个农、林学院的学生毕了业，在技术上学会了种万斤，在政治上沒有学会做群众工作，沒有学会动員群众、組織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那万斤技术肯定不能实现。农民为什么能丰产？咱們一講就是：水、肥、土、种、密工具改革、植保，再加上田間管理，但是一切脫离群众，不会做群众工作，这些本事能不能实现呢？“农民运动”这不是簡單課程問題，是思想問題，是办一个学校的方針問題。沒有群众路綫就沒有生产大跃进；不相信群众，不同群众打成一片，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丰产，即使你在学校能实现万斤，到群众中就不能实现。

上面所談的，一是由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两条路綫来看主席的指示，一是要从群众工作、从与群众打成一片去办农学院来看主席的指示。

用什么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現在科学研究打破了迷信，过去的人，認為科学研究只能是少数的人在試驗室內研究，現在証明，沒有广泛的群众运动，就不会有大量的行之有效的和尖端的科学成果。

这次你們回去，要把中央指示、北戴河會議決定，在党内党外、教师学生、全体人員中 来个大討論、大辯論、大鳴大放，不要首先討論房子搬不搬，搬到哪里的問題，要首先来个思想大辯論，在这中間解决三个問題：

第一、明确地認清中央指示和北戴河會議決定的精神實質，我觉得這個問題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了解。

第二、用这个指示作为武器，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彻底批判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农业科学的学术思想，确立无产階級教育思想、学术思想，树立紅旗，拔掉白旗，以确立新型的共产主义的教育方針。